

我家遭受原子弹爆炸的经历

安井 幸子 （当时六岁）

在距离爆炸中心 900 米的目觉町自家门前遭到原子弹爆炸。在经历了热线、辐射、冲击波并在恐怖与痛苦的煎熬之中失去了四名兄弟。后来双亲相继去世，只有作者一个人幸存。

巨大的不幸和战败

1945 年 8 月 9 日上午 11 点 02 分，长崎被投下了原子弹，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罕见且范围广泛、受害严重的一场灾难。给我的一生留下了强烈的精神影响，50 年过去的今天，爆炸当时的回忆依然非常清晰。且不说原子弹爆炸理所当然地对身体所造成的伤害，仅仅是至今在心灵深处依然无法忘怀那些在一瞬间被夺去宝贵生命的人们、以及后来生活崩溃的悲惨、城市被毁灭的景象，那种巨大的打击，让恐怖感依然在心里无法释怀。

原子弹造成的惨祸是人类的教训，绝不能在历史上重演。如何吸取过去的教训，在今天的核时代维持世界和平，是今后的重大课题。

那天，夏日的骄阳下，因为空袭警报已解除，我回到了在目觉町的家，和邻居家的 5 个孩子在一起玩过家家，正在路上扑石子。没有空袭的短暂间隙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最大的一个 10 岁的女孩子当“妈妈”的角色，就这样孩子们度过着平和的幸福时光。就在这时，听到飞机的轰隆声，10 岁的女孩听到后，对大家喊“空袭，敌机来了，快卧倒”。谁也不可能想到那就是搭载着原子弹的 B29（BoxCar 号）飞机，孩子们就像平时练习一样，彼此重叠着卧倒在一起。就是那一瞬间的事情。异样的闪光袭来，好似很多太阳重叠在一起，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波。在巨响中，好像自己的身体在瞬间浮了起来，但是眼前却什么也看不到。就在那个瞬间，5 个人被活埋了。

被压在破碎的瓦砾下，只要呼吸就好像用水管往嘴和鼻子里面灌水一样，会从鼻子里嘴里吸进很多泥土。我听到了两个女孩的哭喊声，一个小女孩说“妈妈救命，妈妈救命！”另外一个 10 岁的小女孩说“妈妈来之前，一定要坚持。”我能很清晰地听到她们的对话。但是刚刚听到，我就吸进了一口土，然后就什么都听不到了。不知道过了有多久，我被拉出来。那时，火灾已经接近我们。我感到头像裂开一样痛，妈妈一般抚摸着我的身体，一边问我说“当时几个孩子在一起的？”我还是不能发出声音，只是使劲点了点头。这时候，听到身边叔父的声音，“在那里别动”，原来他们在拼命营救着另外 4 个孩子。

4 个孩子也被救了出来，我哭着跟大人逃到了附近的山上。被运到那里的 4 个孩子，都是嘴里含满了土，他们全死了。山下是燃烧中的街道，一幅毁灭的景象。6 岁的我，站在高处俯视着自己家的全景，那还是第一次。长崎简直就是原子弹爆炸后的地狱，可是那也仅仅是悲剧的一个开始。阳光下刚刚还健康生活着的人们，就这样被毁于一旦。

我们一家人逃到山里，在面前有不断经过的受伤人群，有些人被烧伤后，皮肤脱落垂在身体外边。来到山上的伤者陷入了严重的失控状态，不停地喊着“给我水！救救我！”。很多人叫着亲人的名字，茫然地走在荒野上，在生命的尾声无力地倒在地面上或者池塘里。

这个时候，我从恐惧中刚刚醒过神来，逃难到山里，刚刚明白“自己幸免遇难了”。我 14 岁的大哥，肩膀一半被烧伤；二哥 10 岁，在原子弹爆炸后最黑暗的时候，从附近的林子跑下来，和我们汇合，他那时候不知道自己也被照射了大量的放射线，还和大哥一起为了得救而高兴；大弟弟爆炸后被压在家中的瓦砾下，被发现的时候后脑部插着一块木头，被炸当时就已经死了；妹妹被顺利地救了出来。这时的长崎已

经变成了火的海洋，突然下起了黑色的雨。逃来的人们中有的说“是不是美军泼洒下的油呢”。不是油，雨滴打到的地方都留下了黑色的斑点。实际上，这是放射性物质集中落下的标志。在附近的水塘边，很多人在一起喝着水，被烧伤的身体最渴求的就是水。

我的父亲当天正好去格拉芭园附近看望一位生病的同事，所以没在家。出事后，他担心全家人的安危，翻山越岭赶回来，最后在傍晚时分终于遇到我们。周围的山上田里到处是不断死去的人们，面对爸爸的提问“大家没事吧”，很多人没有力气回答。后来到了夜里，我们去附近的国际墓地避难。墓地里也有很多逃难来的人们，黑暗中，不断传来口渴，求水的声音。任何人都毫无办法，好像是人的精神都已丧失一样，大家都只有茫然地沉默着凝视着这眼前的一切。就这样，不安和惶恐不停地袭来。平时最活跃的二哥这个时候开始呕吐，大哥因为烧伤和腿上的外伤也开始发烧。我感觉到食欲不振。那天夜里，就是这样在不断感觉身体异常中度过的。

在8月10日，天还没亮的时候，我的父母去附近的墓地埋葬了大弟弟。只是在他脸上盖了一件衣服，和亲戚的孩子们一起被匆忙地埋葬。母亲在那最后一刻紧紧把他抱在胸前，说“没能救成你，真对不起，原谅我们吧”，那也是那一刻父母唯一可以表达的对他的最后的爱。这时候上空一直盘旋着敌人的侦察机。

父母带着活下来的4个孩子，用布包着脚代替鞋子，全家步行去了4公里外的道之尾火车站，终于走到逃向岛原方向的道路时，已是8月10日的晚上了。救援火车上挤满了人。我们虽然逃离了炼狱般火热的火灾，但满是烧黑尸体的荒野更让人恐惧。妈妈拉着我的手，背着妹妹，爸爸背着大哥，二哥在强烈的呕吐中努力前行。当我们走到道之尾火车站的时候已经是8月11日的早上。火车站周围是成山成海的人群，人群中有些已经没有了呼吸，有些人伸出双手还在悲惨的喊着“救命，给点水吧。水！”。因为太痛苦了，有人喊着“杀了我吧”。在这次逃难的路上，我完全没有见过一个活下来的儿童。

到达岛原车站后，二哥的情况恶化，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大哥、妹妹还有我，去了火车站以北5公里山脚下的一个务农的亲戚家借住。对于我们这些精神和肉体都满目疮痍的人，山里的人用他们大山般宽厚的胸怀，给了我们最温暖的接待和帮助。都说煮柿子叶子比较好，或者绿色蔬菜比较好，我们就这样日夜受到当地人的特别照顾，可是很遗憾我们的身体却接纳不了这些食物，呕吐和倦怠持续着。我的双亲想让我们在山间的自然环境、清新的空气中早日恢复健康，这是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做出的判断，但这是人类第一次经历的核爆，无论他们采用什么方法措施都难以解决这一状况，在重复各种尝试的同时，父母两人的健康状态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我们全家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在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下，时间流逝过去。这些症状都来自核爆放射能，但当时没有人知道。

医院的病房里，与病魔作殊死搏斗的二哥开始出现脱发和高烧持续不退的现象，最后陷入滴水不进的最糟境地。父母和我往返于山间和医院，就在八月二十四日夜晩，二哥力气用尽，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叫着我的名字，说：“小幸，再见、再见了，以后的事儿就拜托你了。”一边说一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面对这极其悲哀的场面，说不出“再见”两个字，只是为二哥伤心。二哥的遗体被放在一块如同一枚纱窗一样薄薄的木板上，被运到距离这里有三十分钟左右路程的亲戚家。父母、叔父叔母和我大家都沉默无言站成一列，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黑暗的乡间小道上，那情景极为悲哀。

二哥去世的两三天后，大哥因身体不适，被放在马背上驮着下了山，送进了医院。他发着高烧，强忍着烧伤疼痛，努力打起精神，下山时还开玩笑说“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骑马。”我们没有把二哥的死告诉大哥。他不会想到那天是他在山里生活的最后一天。进医院后，也没能得到充分的治疗。双臂的烧伤恶化，呈黑褐色，肿了起来，他不停地叫疼。“要是胳膊不痛的话……”大哥说。可父母对此毫无办法，只能拼命地鼓励他。接着就是脱发，持续高烧，终于在九月一日那天死去。临死之前，他对父亲说：“爸爸，别哭了，我打算成为一名特攻队员向他们那样去死，来吧，擦去眼泪，唱首《奔向大海》的军歌，送我走

吧。”二哥和弟弟刚去世，现在又轮到和大哥诀别，父亲再也忍不住，掉下了大滴的眼泪。父亲说：“昭信（大哥的名字），你要为我们活着啊。”大哥还是坚持着，说：“擦擦眼泪，快点儿唱吧。”父亲同意了儿子最后的请求。就在唱到那首歌中间的一段时，大哥安详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父母号啕大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失去了三个儿子。六岁的我，也是悲伤之极，心痛欲碎。另外，9月4日，那位把我从瓦砾下救出来的叔父，先是口腔和咽喉开始疼痛，然后就是高烧和脱发，他痛苦地说着：“就像被千根针扎着般地疼啊。”然后就断了气。叔母也在惨遭烧伤的痛苦之后，于9月6日去世。

虽然那之前的战争时代，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粮，只能到附近的山野里采些藜、山蒜和繁缕草之类来充饥。可母亲一声“吃饭了”，孩子们还是拿着碗筷围拢在一起。有时候吃的是南瓜和番薯做成的像粥一样的东西，看不到什么米粒。即使如此，也不可以随意添饭。如果伸出饭碗说“我还要”，大哥就会说“要懂事，否则妈妈不就没有吃的了吗”。可是妈妈说“你是肚子还饿吧”，她宁可自己饿肚子也要多分一些给孩子们。那时候的战况越来越紧迫。有时不眠不休的日子接连数天。即使那样的情况，我们全家还是相互帮助，为了明天，大家一起健康地生活着。这也成为了我们战中和战后忍受艰苦的精神支柱。但现在，我家开始崩溃，加上精神上的痛苦，更使家庭趋于解体。

两个哥哥刚去世，我就开始发烧，掉头发，口腔出血，完全没有了食欲，并且两手两脚长出许多肿块。随着发烧这些肿块开始化脓，伤口又引来许多苍蝇下卵，十分痛苦。那时候，没有治疗的外用药，甚至没有纱布、包带和消毒液，情况愈加恶化。为了给我找一些食物，父亲去拜访附近的农家，总算要到了一些晾干了的切面，加了些从山里摘来的蘑菇，让母亲给我做了满满的一碗汤面。这汤面救了我的命。

兄弟们去世之后，我们又回到山里时，已是明显早晚骤冷的秋天了。在山里几个月的生活，天天充满了寂寞和悲伤。当听到战败的消息时，我们所遭受的不幸已经太大，即使想重新开始生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父母更是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打击，而愁眉不展，尽管我还是一个小孩子但是看着父母的脸，也感到了不安。可是，无论如何要活下去，要让大家活下去，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决心逃难到了岛原的。这里有丰富的自然和清澈的水，可是我们还没有感受这些，就被赶进了死亡和破灭的世界。在原子弹爆炸后的一个月，我家的兄弟和亲属共有23人被夺走了生命。

活下来的我和妹妹被父母深深地爱着，在被彻底毁坏的环境中生存，我们珍重生的感受，寻找生的希望。当1946年4月，全家回到长崎时，这里仍然残留着许多悲惨的光景。

我们的生活很悲惨，从烧毁的废墟里捡来钉子、白铁皮和木板等造房子。与其说是家，还不如说是小板房。食粮也极度缺乏，只要找到甘薯蔓和野草就塞进嘴里以抵挡饥饿。一无所有的原子弹受害者们，没有可以用来交换必需品的多余衣服，每逢雨天房子就到处漏雨，刮风时大家担心房子是否会被吹走，所以经常有彻夜不眠直到天明的日子。到我们终于可以建起一个像样的家时，已是数年之后的事了。

我妹妹，原子弹爆炸之后身体一直虚弱，在1954年4月因受辐射患白血病，于同年6月死亡。父亲因为战后重建家园的过度劳累，于1961年9月患肝脏病去世。1962年，我病倒于甲状腺癌症，动过两次手术才免遭一死。我虽然得救，可是今后应该追求怎样的人生目标呢？对于自己的将来应做怎样的打算？什么才是值得相信的？来自于死亡、毁灭的世界和未来的不安，使我疑虑我今后能否健康地生活下去呢？青春时代的我，为了这些问题而苦恼和悲哀。更使我悲痛的是，母亲于1965年由于核爆后遗症，患上白血病而离开了人世。

只剩下我一个人生存于人世时，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核爆不仅仅是带来了一时的惨痛的伤害，更主要的是它还带来了其伤害所独有的持续性以及恐怖性。因此，身体上的苦恼自不用说，战后重建的生活基盘也十分脆弱，在各种各样的变化中，我好几次陷于精神即将崩溃之中。生存下来的我，在经受了这些洗练之后，在几十次袭来的不安因素中，才真正确立了生存的意义。那就是我对自己的家族以及众多的无辜

牺牲者深感难过时产生的使命感。作为人类社会中为数甚少的核爆受害者，我要坚决否定核武器，要为人类的和平而生，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信念所在。

每当我想起那些原本应该延续的生命，“与其向天祈祷，不如伏地接受真实的呼唤”的话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许许多多死去的人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人世的？在感慨五十年岁月的时候，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感到对未来所担负的的责任。九死一生的我所担负的使命就是要向更多的人诉说核爆的教训，祈愿永久的和平。想到过去的岁月，现在平稳、健康的生活绝非理所当然来到身边的，它是伴随着诸多痛苦的历史，并建立在这些痛苦的历史之上。我时常这样想，我们要怀着慈爱和感激之心，发挥人类的真实本性，从现在起为了世界和平而努力学习并做出贡献与此同时并将自己的经历讲述传承下去。